

■ 20世纪史学研究

# 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 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带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 社会史论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郭沫若; 陶希圣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5)04-0013-07

**收稿日期:** 2015-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10506)

**作者简介:** 张越,男,北京市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影响范围之广泛、参加论战的派别之复杂、论战过程之激烈,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均属少有,而论战中所反映的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错综关系,更使得这场大论战显得异常曲折复杂。一直以来,回顾、研究、解读社会史论战的各种论著难以计数,从各个方面对论战都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评价。然而,基于大论战本身的复杂性,对这场社会史论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试以怎样从政治视角和学术视角看待社会史论战、大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间的关系提出粗浅认识,就教于同行。

从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情况看,学者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以及1934年到1935年的中

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狭义的则是以《读书杂志》为主要论战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sup>[1]44</sup>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利于明晰问题、展开研究,而在当时的论战过程中,许多问题常常重合在一起,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时间上也有交叉,因此本文所言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是从广义而言的。

在论战刚刚结束的硝烟未尽之时,何干之就写出了回顾这场论战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7)、《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等论著。此后,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等书,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社会史论战,李季、伍启元、马乘风等人也著文对论战本身进行了论述和总结。这些论著讨论了论战的起因、对各派观点的批评以及论战

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需要总结的经验与教训。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社会史论战的整个过程、前因后果及各种观点作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阐述。<sup>①</sup>对论战的总体评价,“学术界占主流的看法是将其作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史学争论”,“对论战的定位掺杂了过多的非学术因素,政治定性遮蔽了真实的学术内容”<sup>[1]78 83</sup>,“过多地强调和阐释论战的政治和革命意义”<sup>[2]</sup>。近十几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史学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史论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并尝试以“学术视野”对社会史论战进行重新审视。<sup>②</sup>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包括对社会史论战的研究,的确存在着“学术视野”偏弱,以“革命话语”的解释成为主流的现象,具体到对这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考察,就往往会带给我们一定的困扰。因为,从既定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野中,我们却看到论战中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有的是国民党人士、有的是托派人士、有的是自由主义者;从以往强调的革命史逻辑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并非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人却认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主张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发展形态去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更增加了我们评价和研究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难度,也是造成今日对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出现了从“革命”到“学术”视野的转变的主要原因。

强调从“革命”到“学术”的“视野转变”,的确是对社会史论战在研究思路上的有益拓展,不过,鉴于社会史论战本身的复杂性,对这样的视角转换还需有所辨析。

1927年大革命失败,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迫使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思想文化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也急剧分化,但是却共同面对着与中国革命前途与出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等重要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造成这场论战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苏联以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为代表的、对中

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导致的政治斗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托洛斯基、拉狄克主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目标应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斯大林、布哈林等认为中国的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占优势,中国革命应该以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结合为主。何干之说“那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分析的结论。前一种主张,是苏联少数党的主张,后一种主张是多数党的主张。这两派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又传播到中国来。”<sup>[3]39</sup>这一原因近来被研究者更为关注。如李勇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一文中说“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sup>[4]</sup>乔治忠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一文中强调“苏联上层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公开的争论与斗争,确是引发中国发生论战的最重要的因素。”<sup>[5]</sup>斯大林的主张成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决议中指出,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双重性质,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样的论断引起中国共产党内的托派领袖陈独秀的异议。中共学者之间的论战,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回应。同时,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同样受到苏联政治论争的影响,发起并参与到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来。

何干之说“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使我们不得不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sup>[3]4</sup>各家各派既已推出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激烈的论战处于僵持阶段,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仍需进一步走向深入,于是,作为社会性质论战的逻辑延

<sup>①</sup> 主要有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

<sup>②</sup> 相关研究可见陈峰《民国史学的转型——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谢保成《学术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何刚《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视野下的叙述》,《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等。

伸,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便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二书,率先将问题引入社会史领域,而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分析研究。狭义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由此展开。1931—1933年,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先后策划刊出了4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高潮。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于3个问题:第一,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何特征?第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对于这些问题,各种观点的论辩错综复杂,诸如中国历史上“有奴”还是“无奴”的观点交锋、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在何时的分歧、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不同时期经济形态特征的各种描述、对中国是亚细亚社会的批评意见等,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不完全以其政治立场趋于一致,各种观点的论证标准及史料也多有交叉重合。总的来看,以《读书杂志》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指数应高于此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由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的主体地位,农村社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一九三四年以前的论战还没有写出一部很完整的结论”,于是“以《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这两个单位为对抗的中心”<sup>[3]127,123</sup>,在1934年又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核心议题是在分析乡村社会性质时,到底应该以分析生产关系为主,还是以分析生产力为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前者,而托派分子则立足于后者。与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相比,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再次使论战内容回归到现实问题中来。

综上,从广义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起因和过程来看,论战的本质当为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但是随着论战的深入,进入到讨论中国社会史性质阶段后,学术指数一度提升,之后又发展到讨论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仍然不脱离现实旨归。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到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讨论再到中国农村性质论战,从《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杂志到《读书杂志》,再到《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杂志,从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战总体上呈现出从现实到历史再回到现实、从政治到学术再回到政治的基本走势,很明确地是以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为基本线索的。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既是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旨,又是以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才使得不同政治背景的派别、不同政治身份以及不同职业身份(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的人都被吸引到论战中来,论战也表现得声势浩大、波澜起伏、交锋激烈、影响广泛。笔者就此认为,即使我们今天意识到需要强化对社会史论战进行“学术视野”的研究,却仍不可忽视社会史论战从始至终存在着的现实政治诉求。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意识,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史论战;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等现实问题的不断追问,论战就不会从开始的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发展到对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再回归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如果论战不是紧密联系现实政治,也不会吸引不同政治和学术观点的各派人士全力投入到论战中来。

将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其重点是将社会史论战的相关起因、过程、观点、派别、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若仅将社会史论战简单地框定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那么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研究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论战中的一些派别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声音被无限放大,而另一些派别则永远处于被告席上,成为被审判的对象,其言论得不到重视”<sup>[1]89</sup>。然而以“学术视野”考察社会史论战,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强调用“学术视野”研究社会史论战,反而更应该透过纷繁的论战表面去客观把握论战起因、过程中所蕴含的政治、学术等多重动因,厘清各种“学术”观点中的现实意图,

“如果研究对象属于或带有政治性质,就需要仔细探讨其中的政治背景、政治主张、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因素所占据的权重,绝不能借口‘学术视野’而抹杀和摒弃史事内本来具有的政治性”<sup>[5]</sup>。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学术视野”的学术研究目的。

## 二

社会史论战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

1930年初,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sup>[6]</sup>。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郭沫若正流亡于日本,他本人并未直接投身于论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是他在日本时完成的,这部著作的著述动因是否与社会史论战有直接关系,目前学术界也存在争议。<sup>①</sup>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确实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史论战。正是1929年出版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和次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率先将问题引入社会史领域,从而引发了狭义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受到动力派即托派学者的激烈批评,也成为《读书杂志》中的主要论战内容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影响到了论战的走向,其主要观点成为论战中的核心论题,对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社会史论战有着直接的关系。该书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标志,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论战的参加者,几乎都以引证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社会性形态理论被广泛接受。<sup>[4]</sup>同时也存在着很明显的問題:(1)简单化、公式化地运用唯物史观,“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sup>[7]</sup>;(2)对引进的西方理论不加消化,盲目跟风,“‘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

懂,总喜欢生吞活剥地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sup>[8]</sup>;(3)为论战而论战,“论战立足于批判,通常只论他人之非,不顾他人之是,而且判定是非的标准往往是主观的,情绪化的议论代替了理性的学术探讨”<sup>[1]64</sup>。

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从“传播”进入到“运用”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据以分析讨论中国问题的平台,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史论战带给不久之后即很快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潜在影响更值得重视。

首先,由于社会史论战是在政治和学术的多重因素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具有“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社会史论战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何干之对社会史论战总结得非常清楚:“这一场争论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sup>[3]4-5</sup>对中国历史上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的判定,目的是为了明了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弄清楚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来看,其研究趋向与问题意识,无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中国近代史,大都与现实密切相关。唯物史观史学与民国时期居主流地位的、以史料考证为主的历史考证学相比,在对史学功能(“致用”与“求真”)的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其次,由于社会史论战是以唯物史观考察中

<sup>①</sup>如谢保成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然有意‘认清清楚过往的来程’以‘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却无心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见谢保成《学术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乔治忠则认为,“中共干部派早期参加者以郭沫若为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见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和阶段特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强调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王礼锡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斗争”,“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sup>[9]</sup> 社会史论战中的基本论题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讨论,具体为奴隶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还是无、封建社会的起迄时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辨析等,这些问题通过论战渐至发展或衍伸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是否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问题、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等。从这些历史理论问题出发去考察中国历史,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宏大叙事为基本特征,这在中国史学中是从未有过的,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确立的经典著作出版于社会史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形成于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鲜明特点是社会史论战给其打下的烙印,可以说,通过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被确立起来了”<sup>[10]16</sup>。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论战之后非常重视对论战中的总结和反思,如何干之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sup>[3]59</sup>。翦伯赞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sup>[11]138</sup> 吕振羽也认为,“当时的论战,有的在玩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也有不少人陷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除真正联系实际的很少的几个人以外。”<sup>[12]</sup> 社会史论战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却为唯物史观史学研究创造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社会史论战,目前只下了序幕,应开垦而未开垦,应解决而未解决的工作还有很多”<sup>[3]5</sup>。对社会史论战的检讨,明确了论战时期唯物史观

结合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缺点、教训,至少在学术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对论战的反思还促成《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导致“食货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纵深拓展,然其已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下文讨论的问题。

### 三

1937年抗战爆发,持续近10年的社会史论战基本结束。乔治忠认为“社会史论战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促进了‘革命’史学体系的建立。”<sup>[5]</sup> 这里所谓“‘革命’史学体系”实际上是在研究者和研究旨趣等方面已经异于社会史论战时期。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在民国时期,“时人似不怎么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提法”<sup>[13]183</sup>。周予同写于1941年的长文《50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将其称之为“释古派”,顾颉刚等在1945—1946年间著《当代中国史学》,将其归之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类,齐思和在其《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称其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这里列举的周、顾、齐三种论著,当为民国时期写就的阐述近代史学史的权威论著,都将郭沫若、陶希圣等一干人视为社会经济史或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员。<sup>①</sup> 民国时期学者对社会史论战的记述主要表现为:第一,由社会史论战而形成的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现象,很快就成为民国时期史坛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研究趋向;第二,在介绍因社会史论战和使用唯物史观而产生的这个新的史学思潮时,他们主要是用“释古派”、“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

<sup>①</sup> 《当代中国史学》在谈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有“郭陶两派”之说(顾颉刚等《当代中国史学》,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9页)齐思和强调,“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这里可见顾、齐等似已隐约感到分别以郭和陶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并非完全相同。

社会史的研究”或“左派史学”来称呼,都不见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称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提法,大约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普遍使用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从发展源流看,其所指包括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郭沫若、吕振羽及中共“新思潮派”一系直到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范文澜等和重庆地区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基本将社会史论战中“新生命派”、“动力派”等排除在外了。据此可以认为,阐述民国时期的史学发展,笼统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史学”恐难准确概括社会史论战中及论战后同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同派别。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以“中国社会史的专攻刊物”相标明,宗旨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sup>[14]</sup>。因《食货》杂志而形成的“食货派”同样直接产生于社会史论战,并且“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sup>[15]</sup>。但是陶希圣声明“食货学会会员不是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这个方法又与什么主义不是一件事情”<sup>[16]</sup>,显然是在撇清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不在一个语境之中。这在讨论社会史论战时有必要予以甄别。

就研究者而言,论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业队伍都是在政治立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人员,此前参加社会史论战的许多人因为政治原因远离或放弃了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历史的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在论战时期,郭沫若不在国内;吕振羽在论战中后期参加论战,他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论著,理论和史料并重,并把中国历史的叙述上推到远古时期,是最早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翦伯赞在论战高潮时期发声并不太多,论战进入尾声阶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论战中的各种中国史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范文澜时在北大任教,从事经学、诸子

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侯外庐在埋头翻译《资本论》,他们几乎没有介入论战。抗战爆发后,1937年郭沫若回国,在重庆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写出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论著。吕振羽在1936年和1937年分别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后,在重庆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上)等论著。翦伯赞在长沙完成了《历史哲学教程》,赴重庆后又撰写出版了《中国史纲》前两卷和《中国史论集》《史料与史学》等论著。侯外庐结束了《资本论》的翻译,在重庆期间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此外,重庆还聚集了杜国庠、华岗、胡绳、嵇文甫、吴泽、赵纪彬、陈家康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延安地区在毛泽东、张闻天、吴玉章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参与下,范文澜、陈伯达、杨松、何干之、叶蠖生、尹达、谢华、佟冬、金灿然等人,则成为延安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主要成员,最突出的是范文澜在1940年8月至1941年底撰写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以延安和重庆两地为主,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业研究队伍。

就研究旨趣而言,1939年冬,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合作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的第一章“中国社会”由他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亲自撰写)一文,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经过从原始公社崩溃到转入阶级生活时代开始,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的不同社会性质,“革命史”体系基本形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既回答了论战之初提出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问题,又对‘中国社会之史’作出系统总结,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三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篇名到内容都显示其是对论战进行的理论总结,成为宣告论战终结的最重要标志。此后,这一名篇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长期遵循的‘最高指示’”。<sup>[17]</sup>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中国史坛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

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我个人认为,民国时期史学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称谓,应当专指从社会史论战期间的“新思潮派”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直到抗战期间延安和重庆地区以及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研究;民国时期所有使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历史研究,宜统称为“唯物史观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包括“食货派”等不同政治立场的相关研究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统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便顺理成章了。

从社会史大论战的各种派别身份的人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性质的不同观点、相互论战,到抗战时期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及以范文澜等史家为代表的延安地区史学和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为代表的重庆地区史学的迅速发展,表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充实、从酝酿到成型的发展过程。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峰. 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 [2] 何刚. 革命与学术的双重变奏——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80年 [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1(2).
- [3] 何干之.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M]. 上海: 生活书店, 1937.
- [4] 李勇.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J].

史学月刊, 2004(12).

- [5] 乔治忠.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4(5).
- [6] 林甘泉.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J]. 历史研究, 1996(2).
- [7] 王礼锡. 论战第二辑序幕 [J]. 读书杂志, 1932, 2(2-3合刊).
- [8] 吴西岑. 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 [J]. 动力, 1930(创刊号).
- [9] 王礼锡. 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 [J]. 读书杂志, 1931, 1(4-5合刊).
- [10] 李红岩.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 [M]// 李红岩.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11]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12] 吕振羽. 关于社会史的诸问题 [J]. 理论与现实, 1940, 2(1).
- [13] 李孝迁. 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4] 编辑的话 [J]. 食货(半月刊), 1934(创刊号).
- [15] 李根蟠.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J]. 历史研究, 1999(3).
- [16] 编辑的话 [J]. 食货(半月刊), 1935, 2(4).
- [17] 谢保成. 学术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J]. 学术研究, 2010(1).

[责任编辑 张艳玲]

##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Disputation on Social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ZHANG Yue

(College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of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1920s and the early 1930s does not mean to neglect or avoid those 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out the debate. Actually, there is a clos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It did not only mak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ve revolutionary and practical characters, but also bestowe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nd grand narration. It w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Yan'an and 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period that made the camp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ake shape and exert extensive influence. However, we cannot neglect the initi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Guo Moruo; Tao Xisheng